

人的培养与研究生教育的期待¹

——三位导师对我的影响

孙庆忠

摘要：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期间的三位导师，用他们的言行阐释了为师之道。乌丙安先生对我的影响是“美”，他的神情和妙语让我记忆犹新；黄淑娉先生带给我的是“真”，她的严谨和自律令我刻骨铭心；沙莲香先生带给我的是“善”，她的责任和使命让我懂得学者的社会担当。通过现身说法，呈现了导师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也在研究生教育的期待中揭示了导师立德树人的职责与使命。

关键词：乌丙安；黄淑娉；沙莲香；研究生教育；真善美

作者简介：孙庆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北京 100083。

在我这一辈人中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的三位导师在不同阶段的教诲，不仅影响到了我对学问、对生活的诸多看法，甚至影响到了我整个生命的节奏。2004 年我开始招收硕士生，15 年间带了 10 位学生。2010 年我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到目前为止招收了 5 名学生。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我导师培养我的往事历历在目，就像标杆一样，让我时时以此为参照，做一名称职的老师，一名让研究生始终心存期待的导师。

(一)

25 年前的硕士生阶段，我在辽宁大学跟随乌丙安先生学习民俗学。乌先生是 1929 年生人，1953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钟敬文先生攻读民间文艺学专业研究生。1957 年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下放到乡村改造了九年零三个月，回到辽宁大学的讲台时他已经年过半百。在其后的 30 多年间，他撰写了《中国民俗学》《神秘的萨满世界》《民俗学原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等 10 余部具有前瞻性和里程碑意义的专著，为中国与国际民俗学事业和民俗学专业教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誉为“我国第二代最富有声望的民俗学家”。

乌先生 2018 年 7 月 11 日在德国去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已数不清多少次想念他了。应该讲，到目前为止，我所有的民俗学的滋养全都来源于乌先生，他确立了我对学科认识的底色。他对我的影响在哪里？除了他在课堂上随意洒落的精彩妙语，让我二十几年之后记忆犹新之外，我们师生之间曾经发生过一个故事，就是上他的课，我竟然有过打盹睡觉的经历，这是 1994 年的事情。

¹本文根据作者 2019 年 8 月 31 日在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导师培训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

我们这一届辽宁大学总共招收了 76 名研究生，而民俗学专业就占了 7 个名额。在民俗研究中心上课时，我们围着乌先生，满心期待，说是着迷也不为过，那简直就是研究生期间最幸福的时刻。老师的讲述如此精彩，为什么还睡觉呢？2006 年他受文化部之邀来北京参加一个“非遗”的会议，我们师生在安徽大厦见面，我重提了这件令我愧疚的往事。我说：“12 年前在您的课堂上我曾打盹，您还轻叩桌台叫了我的名字。也许这件事您早就忘记了，但我一定要告诉老师我那次瞌睡的原因。因为第二天有您的课，头一天晚上竟然兴奋得一宿未眠！”我讲这件事的时候，老师好像有点意外，他没有想到我对多年前的课堂还有这般记忆。我之所以这样讲，没有半点故弄玄虚之意，我读研究生的日子，是在我这一辈子都难以再体味到的兴奋中度过的。每一门课、每一堂课，都那么值得盼望。在学期间，乌先生为我们讲授 4 门课，其中“民俗学原理”他讲了 180 个学时。他的课堂简直就是艺术的殿堂，说唱就唱，说跳就跳，平淡的日常生活在他的讲述中浸透着满满的人生智慧。多年之后，当我自己上课略有心得并沉浸其中时，只要想到乌先生，我所有兴奋的情绪就会瞬间平息，那点因上课而带来的得意和满足，一刻间削减到零。这就是老师对我的深度影响，他让我领会过课堂教学至高至美的境界。作为一位老师，他带给我的是“美”。我沉醉其中，也希望自己的课堂能有点老师的影子，如果我的课堂上缺乏了一份人文学科基本的美感，我会觉得对不住我的老师，也愧对我的学生。我从 1995 年开始回到母校沈阳师范大学讲授“民间文学”和“中国民俗学”，24 年间从未间断下乡，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我的课堂能够因为我自己的体验和我个人的采录而变得丰富多彩，像我老师当年影响我一样，让我的学生感悟生活之美。

而今，二十几年过去了，乌先生带给我那份美依然可以瞬间占据我整个心灵，想到他的时候，我还会久久无法平静，尽情地享受着他传达日常生活智慧的知识之美，就好像重新回归了他的课堂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一直觉得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如我这般幸运。我在中国农业大学工作的 16 年间，每一届学生的“民俗学”课堂，我都会在备课、讲课和课后不止一次想到乌先生。我也因此觉得老师的学术思想可以因我的课堂而再度复活，是我们作为教师最大的幸福。尽管乌先生去世了，明明知道今生再也不能相见，但我却始终能感受到他的精神与我同在。这是老师所传递的最高的人生境界，我已充分体会到了这一点。来到中国农业大学之后，我极力倡导开设“中国民俗学”课程，如今已经 16 年了。我觉得不论学什么专业，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对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

(二)

1998 年，我到中山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导师是黄淑娉先生，她是 1930 年生人，1947 年在燕京大学接受教育，1952 年毕业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她曾参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民族识别，而后多年为林耀华先生做学术助手，是那一代学人当中出类拔萃的女学者。她 1978 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7 年调入中山大学肩负起传承南派人类学的使命，直到 75 岁才退休告别讲台。作为中国人类学领域第一位女性博士生导师，在 50 多年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她对学术研究的激情，她的严谨与自

律，令我高山仰止、终身受益。她为学的时间很长，但门下的学生只有 7 位硕士和 7 位博士。我很幸运能跟她学习，让我拥有了读书的高峰体验，让我对学问充满了敬畏之心。

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这一届黄先生只招收了我一个国内的学生，4 门专业课是黄先生一个人讲的。每每回首学习的过程，感动就会充溢心头。黄先生总会提前 5 分钟开门，总是在马丁堂铃声响起之后说“今天课就上到这儿”。在我的记忆中，4 门课没有一堂课提前过一分钟下课。在 4 小时的课程中，她会让我汇报 3 个小时，这是一周读书的心得。我相信很少有人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也正是在她的催促之下，我在三年的学习时间里读了六年的书。上第一次课的时候，黄先生拿给我一摞手写的书单，总共有 89 本。我说：“老师，我三年要读这么多书吗？”她说：“这是这学期这门课的书单，不必全读，但是我指定的你一定要读。”一个学期下来之后，我读了 32 本书，对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学的认识从此有了一个基点。当然，这门课黄先生给我最大的冲击在于，她要求我读的每一本书她都跟我同步阅读，她的讲授分享总能引导我急切地去看下一本书。年近七旬的老师如此这般，我哪里敢有半点偷懒。因此，每周向黄先生汇报读书所得之后，最期待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小孙，这周的书读得不错”，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了。

在我读博士期间，还有一件事刻骨铭心。1998 年中山大学招收了 166 位博士生，导师在培养学生的各环节都拥有自主权。那时候，提交给研究生院的专业课成绩单只要有导师签字就可以了。因为是跨专业读博，每门课的书我都看不过来，文章没有时间写，也不会写，便请求老师先给成绩，以便在规定的日期内上交成绩单。黄先生说“我没有看到你的文章怎么给成绩呢”，于是就在盖有研究生院章的单子上写下三个字“待审核”。我的 4 门课有 3 门待遇如此，她用行动教会了我如何对待学问，如何对待培养学生的每一个细节。新学期补交作业之后，我急切地盼望老师的回音。第三天的下午，黄先生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她家里取成绩单。中山大学的校园布局中区是教学区，东区是学生区，西区是教工住宅区，从东区到西区要走 15 分钟左右。黄先生给我两门课的成绩都是 85 分，虽然与我期待的“优秀”有落差，但是我没有怨言，我不敢，因为她对自己的要求是我这辈子都难以企及的——说话不说一句废话，写文章不写一个错字，这是她与吴文藻、费孝通和林耀华等前辈学者一起工作和学习中训练出来的。等我拿着成绩单回到宿舍的时候，黄先生又打来电话说：“小孙，我想改变一下成绩，因为不能仅仅看你最后交给我的这份作业，还要考虑到你一个学期的学习态度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决定把两门课的成绩由 85 分改到 86 分。”我说：“能获得老师这样的评价我已经很满足了，成绩就不用改了。”她说：“如果你现在不来的话，我就去你宿舍找你。”我拿着 85 分的成绩单跑到黄先生家时，刀片、笔和一把尺子已经在桌子上摆好，她用刀片刮过之后，把两个 85 分改成了 86 分。

这件事情也许在很多朋友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难道只差一分吗？但事实上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学者为学、做事的态度，是老师对学生的最用心的评价。我从中看到的，是一个学者的自律，是为师者对自己的要求。我来中国农业大学之后，几乎每一年在研究生课堂上都会讲这个故事，也因此与 90 分相比，我的学生们可能更愿意将 86 分看作是我对他们最高的评价。

如果说乌先生教给我的是“美”，那么黄先生教给我的是“真”；如果说乌先生的神情与妙语让我终身难忘的话，那么黄先生的严谨与自律让我目睹了导师的最高境界。老人家已经 90 岁了，每次和她视频时候，她总是在手机的屏幕里带着微笑看着我，话语越来越少，但是我看到的依旧是那个游走于西南少数民族村寨的女人类学家，目光坚定，一如当年。

每一年我不知道会多少次想到黄先生，特别是在田野调查的时候。2019 年 1 月我和学生去云南宁蒗摩梭人村落生活的半个月，以及刚刚在云南绿春哈尼族村寨调研的 20 天，我总会在某一个瞬间想到我的老师，那一刻好像她就坐在我的身边，和我讲述 1954 年她跟随林耀华先生在彝族地区调研的种种经历，以及在数月劳顿后走铁索桥、过金沙江时的独特心境。2018 年 8 月和 2019 年 1 月，我曾两度去小凉山摩梭人村寨，当车走到金沙江畔的时候，我特地说要停一停。那一刻间我不是为了欣赏金沙江峡谷的壮美，只为能够在 60 多年之后与我老师在同一个地方，在精神上还能有一次相遇。

我们调查的摩梭人村寨，20 世纪 30 年代有李霖灿先生的足迹，50 年代和 80 年代有詹承绪与和发源两位先生的采访记录，他们进村路上的时间以月、以周计算，而今我们从丽江出发仅用 12 个小时。虽然也是舟车劳顿，但与前辈学者的探究之路相比，真是不值一提。想到黄先生在西南走过 13 个民族聚落，想到那么多留有她文字印记的村寨，我就会心生仰望之情。今天因为研究农村发展的缘故，我能够有机会重走黄先生走过的路，这种幸福感一直洋溢心头。

在村里调研的时候，有的学生会说这里生活很苦，农民的节奏难以适应。每当这个时候，我还是会想到我的黄先生，想到 20 年前她给我上课时讲到她在黔东南做调研的小事。她说早晨五点钟就醒了，静静地躺在床上看着木头房子的天花板。为什么不动？怕自己的脚步声影响主人休息，只有透过不隔音的楼板听到主人起身的声音时，才能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什么呢？看似平常，传达的却是对乡民的尊重。她对自己的这份自律，对做学问的这份要求，是我们这一辈学者最缺少的。我多希望自己能在生活里不时地体味这些看似琐碎却极具深意的往事，这也是一个老师对于学生产生深度影响的往事！

今年我在云南调研的时候，我的学生说：“老师，他年之后我们再来云南调研的时候，不仅仅会想到李霖灿先生、詹承绪先生、和发源先生，也会想到黄淑娉先生和您！”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已老去，而你们却依然能够记挂这片土地，记挂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以及做学者、为人师所秉持的精神理念，也算有了一份遥远的回响。”这是我的第二位老师对我的影响。

(三)

2001 年我博士毕业之后，一心想着要做两方面的研究：一是要做历史地理的研究，二是想进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我发现人类学研究向宽度和深度拓展，这两个领域是必要的，对我个人来说更是急切的。我对心理学的研究涉猎太少，我想在人类学看似表层的民族志背后，去挖掘更深厚的个人和群体的文化心理，也因此和中国人民大学沙莲香教授结下了师生之缘，走进了她的民族性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初，沙老师东渡日本，在东京大学研修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这是她研究中国人的起点，在其后

的30多年里,对人的关切、对中国现代化之人格力量的探寻,贯穿其学术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沙老师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研究,记录了中国人从“文化自知”走向“文化自觉”的过程。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更是一段生成民族智慧的心灵之旅。她的代表作《中国民族性》(一)(二)(三)是其忙碌笔耕与深邃思索的集中呈现,不仅勾勒了中国民族性的研究轨迹,也熔铸了她对学问的倾情、对人之精神世界的凝注,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

在中国人民大学期间,正值2001年申奥成功,9月初,在我跟老师见面的第一堂课上,她说:“小孙,一个时机到来了。申奥的成功对于中国人整个的精神走向将会产生重大影响,人文奥运这一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民族性提升的契机。”也是在同一时期,她提出一个命题——“中国人比任何时期都需要心理学”。在她看来,如果我们这个时代不能解决中国人的心理问题,我们的21世纪是可怕的,人性的邪恶将会不断彰显。今天新世纪悄然间走过了将近20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就如魔咒一样被她言中。所以我在每一年的“社会心理学专题”的课堂上,都会自然地想到我这位三个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而今,她也已经84岁了。我的专题课上有一讲是固定的,“心灵环保: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心理基础”,是讲给我学生的,更是献给沙老师的。

回首博士后的两年,沙老师给我的深度影响是她的社会关怀,她希望能够寻找一种路径去破解中国的现实问题。我对沙老师心生的敬爱之情,主要是源于她真心真情的责任和使命。这份使命意识也总是不断地催促着我,跳出自己去看一个群体、看中国社会心态的整体走势。沙老师虽然年事已高,但却如20年前一样,关注中国人素质对中国现代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寻找的依旧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群体性格和内在动力。我每一次下乡,她都是一个“粉丝”级的追踪者,她会问我今年假期去哪里,别忘了给她发照片,要告诉她那里的农民今天生活得怎样。所以,一想到她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肩膀太窄、能力太弱,能为社会做的工作太少。在今年6月我们举办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乡村青年研修班上,在结业仪式的讲话里,我问乡村青年,我们的生命和乡村建设有关吗?当然有关。我们走过的每一个村庄,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师生走过的每一个田野点,不就是今天乡土中国的写照吗?当我们自己这样追问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个人的命运和整个乡土中国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没有一刻游离。我也在问自己,孙庆忠你所做的事情和中国教育有关吗?当然有关。因为你的每一次授课都是中国教育的一部分,都代表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展示着作为导师的精神品质。因此,每一堂课能不能成为改变自己,继而提高学生生命质量的有效路径;能不能让我们在这简单的叙事当中,在思想跃动过程中,还能够浅浅地感知到一份生命的质感,这是我一直追问的教育教学问题。

今天重温三位导师对我的教诲,分享我从中体会到的“人性之美”和“为学之美”,感触尤深的是,他们虽然从事的专业不同,个性差异极大,但是却从精神深处传递出了共同的理念——学者的高贵品质和为人师的信念与素养。回顾自己在中国农业大学工作的日子,比照我的老师为培养后辈所付出的心血,我知道“导师”这个名号对我有多么的重,有时甚至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在我们社会学系建系20周年的时候,当学生对每一位老师做口述采访的时候,我曾用三个词形容过老师的处境——如坐针

毡、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表面上看，做老师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当你赋予这个身份特别的意义时，这个称号真的重如泰山。庆幸的是，我的三位老师都用他们的言行阐释了为师之道，都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告诉我如何做一个最好的老师。尽管我做不到，但我知道做一个老师应该是什么样子！

(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年第2期)